

卡拉扬
访谈录

[英] 理查德·奥斯本 著 秦启越 译

Karajan
Musician

世界大音乐家访谈录丛书

东方出版社

卡 拉 扬 访谈录

[英] 理查德·奥斯本 著 秦启越 译

東方出版社

策 划 刘丽华
主 编 焦东建 董茉莉
特约编辑 樊燕华
装帧设计 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卡拉扬访谈录/[英]理查德·奥斯本著;秦启越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

世界大音乐家访谈丛书

ISBN 7-5060-1650-8

I.卡 II.①理…②秦… III.卡拉扬(1908~1989)—访问记
IV.K835.21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1581号

书 名 卡拉扬访谈录

KALAYANG FANGTAN LU

[英]理查德·奥斯本著 秦启越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4年2月第1版 200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1/32 印张6.625

字 数 114千字

书 号 ISBN 7-5060-1650-8

定 价 22.00元

序言

1989年7月16日，赫伯特·冯·卡拉扬在其萨尔茨堡附近的家中去世。而此前六周，同样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他花两天的时间敲定了这部访谈录的最终文本。

4月，他辞去了柏林爱乐常任指挥的职务，也许这让他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郁郁寡欢，但从表面看来，他精神状态很好，无论是私下的闲聊还是公开的思考与回忆，他都侃侃而谈，一如往昔，自1977年我初次与他会面以来，我所认识的他一直如此。

他选择在4月辞去柏林爱乐常任指挥的职务，尽管这出乎人们的意料，但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一直都在猜测，也许最终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于一个81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他在其最后一个冬天里的日程安排简直令人难以承受：音乐会，录制唱片，与柏林爱乐出访欧洲，生平第一次录制威尔第的《假面舞会》；2月，与维也纳交响乐团出访纽约，安排时间把珍贵的录像带剪辑成电影。总之，这说明了许许多多。

他以一个训练有素的校对员的眼光阅读了本书的打字稿，尽管他极少要求改动；前面的介绍性导言和脚注只字未

改,而只对访谈内容的重点部分和措辞方面有一些细微的改动。他随意地谈论着离开柏林这件事,却不让我记下与他最终的离开密切相关的任何事情。卡拉扬极富容忍之心,他总喜欢找到适当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无论如何,他太擅言辞,以至于无法以纯个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60年的职业生涯,他在别的时间别的地方目睹过类似的事情,尽管我认为他是因为近些年来与欧美一些大管弦乐团断绝了工作关系而感到伤心难过。

记录在本书中的对话,是在我对卡拉扬的正式采访以及与其私下交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些采访和交谈首先于1977年5月和12月分别在萨尔茨堡和柏林进行,而最重要的是后来于1988年3月至1989年6月我三次拜访萨尔茨堡和柏林时所得。早期谈话的摘录发表在《留声机》杂志上,曾引起过广泛的兴趣。而把它们扩充整理,以更永久的方式发表的想法则是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卡拉扬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81年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他带领柏林爱乐的成员来到牛津谢尔登剧院,以示他对牛津大学的尊敬。此次演出的曲目包括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No.2,莫扎特的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No.3(安妮-索菲·穆特独奏),理查·施特劳斯的《变形》,艺术家所有的演出收入全部捐献给当地的慈善机构,主要用于治疗少儿心脏

病、帮助儿童孤独症患者，以及用于神经系统的科学研究。卡拉扬对自己所谓的“牛津概念”颇为自豪，并许诺说，一旦完成了他的共计45盘录像带的主要曲目的摄影及剪辑工作，他将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这件事情。索尼经典(Sony Classical)影像公司将从1990年开始推出这些录像带。

卡拉扬是一位伟大的指挥、管弦乐队艺术家，音乐界杰出的同行及大众对他指挥的乐曲毫无争议，但他的职业生涯不仅与音乐密切相关，同时还涉及到科学、技术、政治诸方面，以及作为一个西方人与西方思想紧密联系的神学，这一切都需要细心掌握。总有一天，有人会为他写一部恰如其分的批评性传记，令人鼓舞的是，为此瑞典历史学家兼研究1918—1945年德国音乐制作的专家吉塞拉·塔姆森，已经花费数年时间，通过乌尔姆、亚琛、柏林、科布伦次以及其他地方的档案，来研究卡拉扬的早期生涯。

本书不是一部批评性传记，确切地说，它是一部音乐漫谈录，我希望它能使人们对卡拉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及作为一个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卡拉扬的晚年生活的印象。

音乐访谈录并非一定要排除音乐政治，尽管出于某些原因，试图让卡拉扬深入探讨他在何时、何地及为何加入纳粹党并不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首先，1986年罗格·沃恩出版

的《卡拉扬：生平画像》一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已经使事情陷入了僵局，同时卡拉扬与奥地利批评家弗朗茨·恩德勒合作，仓促出版了《卡拉扬自传》，书中卡拉扬简慢地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对沃恩的著作从各方面做出了尖锐的反驳。卡拉扬再三强调，他1935年加入纳粹党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是为了保住亚琛音乐总指挥的职位，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从不隐瞒自己野心勃勃这一事实，被乌尔姆歌剧院解职后，短时间的失业状况几乎让他发疯。事实上，他经常使用富有特色的自贬性语言——“为了得到亚琛的那份工作，我都可以去杀人”——来强调他当时的野心和绝望有多么强烈。不幸的是，在这一事件上他自认为的坦率却早在1957年就遭到了反击，一种论点被传播得越来越广，即为了政治需要，他不止一次加入过纳粹党，此前还有1933年在萨尔茨堡和乌尔姆的两次。但吉塞拉·塔姆森的研究结果最终会揭示详尽的细节，忠实的纳粹追随者多次申请入党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肯定将被证明是子虚乌有，是由于对证据的误解。在沃恩的传记中，卡拉扬面对那些证据不知所措。“这是假的，假的”，他只能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事实上，不能说那些证据是虚假的，而只能说对它们的解释方式是错误的。可悲的是，他从不耐烦自己去调查事实的真相，直到去世前的几周，他仔细研究了一番塔姆森的调查结果，这才

认识到自己掉进了别人为他设好的圈套。

事实究竟如何？首先，1933年4月在萨尔茨堡，虽然卡拉扬被提名参加当时还是被禁止的纳粹党，但他并未去取他的证件、在上面签名并缴纳党费，然而注册登记（编号1607525）已成为文件而被收藏，此后便赫然出现在各种备忘录和调查卷宗中。另外，与初步的证据相反，他并未于1933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首先，党员号码太高（3430914），不可能是那一天。在纳粹吸收党员的活动被冻结之前，从1933年5月到1937年3月，纳粹已发放出去的最高号码是3262698。然而，冻结期间各种政府官员、外交官及其他人分配到的证件都印有NG（Nachgereichte）^①的字样。按照惯例，这些证件追溯到冻结期开始的1933年5月1日生效。卡拉扬在亚琛时的证件即是一份NG证件，其编号与1935年已发送的一批号码相符合，卡拉扬一直确定自己就是在这一年被要求加入纳粹党的。

令人不快的是，在卡拉扬一生中，这些初步的证据都被广泛引用。有时无疑是由于善意，但也不乏消极的影响。例如男高音歌唱家何恩·维克斯几年前就曾说：“像卡拉扬这种卓有成就、为音乐制定标准的人，当他的能力和思想远远超出众人时，就免不了四处树敌。这是人性中可悲的弱点之

① 德文，意为复兴。——译注

一。他是妒忌和怨恨的牺牲品，这让我极为震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一个有着纳粹背景的老人，难免在其反对者发起运动时成为众矢之的。不难理解，参加运动的人们希望在公众意识中时时展现一个纳粹大屠杀中种种暴行的活教材。但以他为目标开展的诸多运动，最终却变得极为夸张，令人觉得疯狂，甚至残忍。

卡拉扬在去世后也未能躲过新闻报纸和广播电视讣告中的恶言诽谤。1989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举办的一场古典音乐会上，举办者对卡拉扬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生平总结，最终明确地把他和纳粹大屠杀联系起来。从举办者提出的事实看来，这一切可能貌似合理，但许多事实的真相却又如何？其中一种陈述即是典型的歪曲事实：“卡拉扬不是偶然地成为纳粹党人的。1942年，当他发现第二任妻子有部分犹太血统时，立即与她离了婚。”事实是，1942年10月22日，卡拉扬与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安妮塔·古特曼结婚，1958年离异，部分原因是安妮塔不能生育，而此后直到卡拉扬去世，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此外，与安妮塔·古特曼结婚10天后，卡拉扬即申请退出纳粹党。其结果是二战后期他为了工作四处奔波，而作为一个不受政府和党政机构欢迎的人，他很难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卡尔·伯姆离开德累斯顿歌剧院后，卡拉扬的工作申请遭到否决，据说这是在希特勒的直接授意

下否决的。

卡拉扬充满了神秘色彩，其一即是因为他很少接受采访。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除少数情况外，似乎评论家和记者好像更喜欢采访作为公众人物的卡拉扬，而不是作为音乐家 and 不喜欢谈论私事的卡拉扬。在我的介绍性文章里，我主要探讨由卡拉扬非凡的音乐生涯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并说明有些记者即便称职且了解情况，但他们采访和描写卡拉扬时所采取的方式却说明他们似乎更希望去证实先入之见，而不是去追寻自己深刻的见解。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备受关注的并不总是他的作品，这似乎具有某种讽刺意味。但卡拉扬是一个通情达理、极为宽容的人，或许他始终明白这种情况。1977年他告诉我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指挥和指挥艺术的书。当然，我不想在其出版前抢先得到他的资料，但当我提到这件事时，他摇了摇头：“没关系。一件事你说一遍没人听，可是如果你说上20遍……”

卡拉扬做事素有长远的计划，指挥演出时如此，寻求尽善尽美的音乐制作环境时也是如此，这是他最非凡的品质之一。有时，或许正是这一点使事情变得麻烦：我很难诱导他改变思绪，对过去60年来或更为久远的欧洲音乐制作的历史，他有全面而精确的知识。但我确实希望这些谈话的内容能在回忆与期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同时表现出对卡拉扬

指挥艺术恒久有趣的领悟，一如卡拉扬对指挥艺术的领悟。

他英语说得相当好——“斟酌词句，表达清晰”，瓦尔特·李格曾经这样评价他。1922年，14岁的卡拉扬在英国呆过三个月，从那时起他的英语就不错。但每当某个问题需要澄清或某种措辞需要润色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改。

在准备这部访谈录的过程中，我要感谢几年来一些朋友对我的帮助，尤其是世界影视公司的尤里·马科尔博士，洛蕾·萨尔茨博格夫人，汉堡DG公司的安琪儿·亨内京夫人，巨大的卡拉扬图片档案馆的保管员齐格弗雷德·劳特瓦瑟，以及伦敦的《留声机》杂志。因为赫伯特和艾丽特·冯·卡拉扬以及他们在萨尔茨堡郊外住所里的工作人员的热情款待和无私帮助，我的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对于这种朴实无华的乡村隐居地，任何英国人都会感到羡慕。此外还有艾丽特·冯·卡拉扬的花园，这里仅有的新奇事物是三只美洲驼和曾在《卡门》中出现过的一头可爱的驴子。远离了流言蜚语，在这所坐落于一块巨大的草坪中间、被群山和针叶林环绕的农庄住宅里，和卡拉扬交谈始终是一件赏心乐事。楼上他正在为妻子的油画布置一个画廊，楼下的一切则相当简洁，几乎是西多会风格。6月，巨大的花瓶陈列在起居室周围的明净如洗的松木地板上。越过草地远眺，可以看到翁特斯堡山若隐若现，这时你还需要什么浮华和富丽堂皇呢？卡

拉扬或许已经得到了一切，但在日常生活中，他的需求少之又少。

至于卡拉扬本人，他经常问我和他在一起感觉如何。我想我对他的印象和那些直接认识他而不是通过报纸认识他的人的印象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很多歌唱家和演奏家对卡拉扬在他们的生活及事业上给予的关照都心存感激。必须指出，他们对卡拉扬的看法和那些来自小乐团的音乐家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主要是管弦乐队演奏家，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乏味的回忆录。几年前，我在《留声机》杂志社的同事、评论家、斯基的那维亚音乐权威罗伯特·雷顿曾在柏林拜访过卡拉扬，和他探讨西贝柳斯的音乐。后来他写道：“这次会面留给我的主要印象完全不同于他作为超级巨星的公众形象，他非常坦率，单纯而自然，完全献身于他所认识的真理。”

与卡拉扬交谈久了，你就不可能不会感受到他的魅力，对他的尊敬，以及最终对他的热爱。他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如果这些看法和谈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理想和成就，那就达到其目的了。

理查德·奥斯本

1990年3月

目录

序言	(1)
卡拉扬：音乐家传略	(1)
第一章 成长岁月	(47)
第二章 情系意大利	(81)
第三章 柏林爱乐乐团	(95)
第四章 论指挥艺术	(111)
第五章 西贝柳斯、 理查·施特劳斯及第二维也纳乐派	(129)
第六章 唱片与胶卷：记录遗产	(151)
第七章 后记	(165)
第八章 跋	(175)
附录1 卡拉扬与牛津大学	(178)
附录2 卡拉扬与歌剧作品	(181)
附录3 录音作品选	(186)
附录4 传记选 (1999年1月修订)	(197)



卡拉扬：音乐家传略

随着 20 世纪步入尾声，那些其事业贯穿其中的杰出人物的生活，也随之呈现出特别的意义和韵味。或许，无论在任何时代，赫伯特·冯·卡拉扬都将是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物——极具音乐天才，智力超群，心无旁骛且罕有人能够企及——这样一种人生在 20 世纪尤其令人着迷，尽管这一点尚未被那些初入道的传记作者，或者发现卡拉扬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新闻价值的记者们所深切体会。

当然，自尼基什 (Arthur Nikisch) 时代以来，一直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指挥家看起来似乎比他所指挥的乐曲更有魅力。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些伟大的音乐家给我们带来的那份激动和兴奋、那种现场感时，也许我们应不必过分担忧。莱奥纳德·伯恩斯坦曾说库塞维茨基的每一场音乐会都是一个“节日盛会”，这是好事。同样，卡拉扬的音乐会在过去的 40 年中也一直是最为风光的节日庆典。自从 1946 年开始认真录制节目以来，卡拉扬的唱片已卖出一亿张左右。有人一直在尝试着把这一惊人的成就描写成一种音乐上的消费主义形式。几年前，罗伯特·切斯特曼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对卡拉扬的一次采访中，对此曾有涉及。但是爱乐者们却并不像某些

批评家以为的那样易被愚弄。毫无疑问，卡拉扬的成功正是在于他将自己专业的、令同行敬佩的音乐制作水准，与涵盖了众多曲目的一系列真正杰出的演绎结合起来。

不幸的是，在独裁主义——指挥职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政治的层面越来越受到质疑的时期，这样一个成功的故事却给卡拉扬招来非议。反过来说，若允许作家和批评家把卡拉扬塑造成一个普通人、一个音乐家的形象，则与现实又相去甚远。这样做既曲解了卡拉扬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对其真正的历史价值的关注。就卡拉扬而言，这是被一系列假设夸大了的曲解，诸如有关对音乐的阐释、对所谓的完美主义的崇拜的假设，即在音乐和技术、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的假设，这些假设常常缺乏在事实及知识方面的可信度。

几乎从每个层面上来说，人们对卡拉扬的看法都充满了矛盾。事实上，尽管时间很短，但表面上，卡拉扬曾是欧洲音乐总指导（20世纪50年代末，他曾同时在维也纳、柏林、萨尔茨堡、米兰和伦敦担任过重要职位）。在英语国家里，人们对卡拉扬或多或少都有些怀疑。在那里，人们会很自然地对超级文化英雄，对指挥家超人这样的观念表示怀疑。卡拉扬，这个勤奋努力的见习指挥，在乌尔姆为人擦洗舞台或用手推车把道具送到排练大厅的伙计，反倒更适合于英国人的

口味。卡拉扬，这位幸存者，尽管饱受病痛折磨，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到场指挥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出。他演技卓越，在对乐曲精神上的领会可谓细腻而丰富，正如1988年秋他在伦敦指挥的那次演出一样，受到了人们持久的发自内心的欢呼。这一点几年前在休·马久尔(Hugh Maguire)那里就已得到了证实。马久尔是英国管弦乐团负责道具布置的一个老手，同时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卡拉扬的崇拜者。他曾说：“他太强大，太有力，太丰富，超过了一般人。哎呀，我已经有25年没和他一起共事了。”^①卡拉扬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一句“哎呀”也流露出这位音乐人的内心情感。

卡拉扬这位富有力量的人的冷漠常常被那些偶然见到他的人说起。1972年，当克里斯蒂安·斯蒂纳(Christian Steiner)为卡拉扬拍照时(后来，拍摄的照片被人多次谈论)，^②他曾就卡拉扬的显而易见的冷漠及沉思做过报道。由于卡拉扬对拍照可说是爱恨交加，憎恨它在音乐厅里对音乐演出的侵犯，对正襟危坐的拍摄也深感不安，因此斯蒂纳的观察自有其角度，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卡拉扬那冷静、超然的品质形成了他的音乐及他本人，同时使他成为令人钦佩的西贝柳斯和已故的马勒的阐释者。另一方面，只要是熟悉卡拉扬的人可

① 安德烈·普列文(编辑)，《管弦乐团》(伦敦1979年版)，180页。

② 《歌剧院》(伦敦1982年版)，87—89、111页。《留声机》杂志(1954年)31期，333页。